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体育对外援助研究

袁雷¹, 郭昱铄², 俞大伟¹

(1. 吉林大学体育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12; 2. 吉林大学商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 在国际关系视角下, 运用逻辑分析、历史研究等方法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体育对外援助进行研究。在深入阐述其转变, 综合提炼其特点, 客观总结其贡献基础上, 得出研究结果: 1) 伴随着经济因素的凸显, 减少了援建体育场馆设施以减轻国家财政负担; 2) 在处理体育对外援助中的意识形态色彩趋于淡化, 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体育交往逐渐增多, 主动融入国际社会, 积极参与国际多边合作机制、国际间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发起的多边体育援助; 3) 体育教练的长期外派与体育专家的短期讲学相结合, 重视对受援国软件方面的援助, 丰富了民间体育援助的力量; 4) 促进了受援国体育事业的普及和提高, 能够始终如一地承担国际责任, 有效配合了国家外交大局的需要。

关键词: 体育对外援助; 援建体育场馆设施; 援外教练; 民间体育援助

中图分类号: G80-05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4-0560(2016)04-0048-06

Sports Foreign Aid in China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 up

YUAN Lei¹, GUO Yushuo², YU Dawei¹

(1.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Jilin, China;

2. School of Business,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Jilin,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studied China's sports foreign aid problems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 u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using document literature logic analysis and historical research. Based on the depth of the transition to synthesize its characteristic and objective summary of its contribution, we have got the following results: firstly, with the highlight of economic factors, reducing the sports facilities built by China to alleviate the country's financial burden. Secondly, in the treatment of the sports foreign aid, the ideological color is fading. Sports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western developed countries increases gradually and actively melted in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international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mechanism, 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launches multilateral sports aid. Thirdly, combining long-term sports coaches from abroad with short-term sports experts to give lectures,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recipient software assistance and enriching the power of the folk sports aid. Finally, promoting the popularity and improvement of sports in recipients and help them undertake physical culture and sports, taking consistently on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 and effectively cooperating with the needs of the nation's overall diplomacy.

Key words: sports foreign aid; sports facilities construction; foreign aid coach; folk sports aid

1 改革开放背景下中国体育对外援助的转变

20世纪70年代, 由于中美关系的突破和改善, 在中、美、苏之间形成了一个“大三角”均势格局, 中国的国家安全环境有所好转, 为中国制定和实施新的对外战略与对内政策提供了合适的外部环境。1976年, 随着“四人帮”的垮台, 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至此结束。由于受到“左”的路线影响, 中国的经济建设几乎陷于瘫痪, 综合国力大为削弱, 体育对外交往活动骤然减少^[1]。中国领导人进行了沉痛的反思, 清醒地认识到世界上的和平因素远远超过了战争危险。

1978年12月,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

召开, 标志着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国家领导人开始对党的指导思想、路线和政策进行全面的拨乱反正。邓小平对中国的内政方针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 不仅对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而且直接影响了中国体育对外援助的转变。1) 中国不再需要在第三世界建立一个反对某个主要威胁的统一战线, 体育对外援助被当作争取同盟工具的重要性大为降低, 在和平因素占据主导的情况下要灵活利用。2) 殖民体系面临着全线瓦解, 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都获得了独立, 它们以推动民族经济发展为己任、加快重建国际经济新秩序为目标, 中国体育对外援助更加注重促进受援国经济的发展。3) 国内

收稿日期: 2016-04-15; 修回日期: 2016-05-29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合作共赢视域下中国体育对外援助运行机制研究”(15BTY004)。

作者简介: 袁雷(1968—), 男,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体育社会学。

经济建设是需要投入大量资金作为支撑的,中国越发感到资金的匮乏和使用的不合理,因此开始对体育援助进行改革和调整。

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体育对外援助的特点

2.1 意识形态的淡化和经济因素的凸显

改革开放前,派遣援外教练是中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无偿援助,宗旨是“尽国际义务,为世界人民服务”。作为国家的一项战略支出,财政每年都要拨专款用于援外教练工作。1980年11月,《关于做好对外援助工作的意见》的下发,确定了对外援助改革的指导思想,即“认真做好援外工作,广泛开展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进有出,平等互利,为促进友好国家的经济发展,加速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做出应有贡献”^[2]。由此可见,在对外援助的实施中经济因素凸显,被置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意识形态的淡化和经济因素的凸显,还可以从20世纪60年代《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与20世纪80年代《对外经济关系四项原则》对比中体现出来。从1964年周恩来总理提出八项原则的具体内容中不难发现,中国将受援国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并未重视自身的经济利益。在1983年提出的四项原则中,清晰可见既继承了八项原则的精髓,还增添了改革的思想 and 发展的策略^[3]。将二者进行比较,差别明显。虽然都有“平等互利”,但四项原则关注经济上的互利,而八项原则更关注政治上的互利。从流动方向上看,八项原则强调单向援助,而四项原则更强调援助的双向性,并提倡采用多种多样的经济技术合作。

改革开放前,受意识形态因素的困扰,中国与西方国家和非社会主义国家的接触十分有限。而改革开放后,中国主动融入国际社会,与上述国家的关系有了长足的进步。20世纪80年代以来,吸引外部人才来华工作、接受发达国家的体育援助,成为中国对外人才交流的重要内容。1982年2月11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驻中国大使修德在大使馆举行仪式,将该国政府捐赠的一批运动器材转交给中国田径协会^[4]。国外一些优秀教练员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到中国执教,在足球、艺术体操、拳击、摔跤、柔道等项目中,就有来自挪威、加拿大、奥地利、美国、日本等国的教练。这些教练员带来了前沿的训练思想和方法,对中国体育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促进了中国体育对外援助的有效实施。

2.2 开始重视软件体育对外援助

改革开放前,为受援国援建体育场馆设施时,中

国只重视在硬件方面的无偿援助,忽视了在软件方面的培训,经常出现援建项目在移交之后运行不顺畅的情况,后期的管理和培训为中国增添了负担,阻碍了援建项目的顺利使用。随着中国成功交付援建成套项目的逐渐积累,如何巩固援助项目成果已经成为体育援助中必须加以重视的问题。中国援建的体育场馆都是符合国际标准的,配套设备也是先进的,在实际运转中更需要受援国配备专业的管理人才和技术人员,合理制定规范的运营制度和工作程序,来有效维持这些场馆的日常运转。因此,在充分吸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中国增加了对受援国软件方面的援助。1984年7月1日—1985年7月1日,中国体育场技术合作组一行赴冈比亚,对中国援建体育场的设施使用进行技术指导,并为冈方培训技术人员^[5]²⁰;1984年7月29日—1985年7月29日,中国体育场技术合作组一行12人赴布基纳法索,为其培训体育场管理人员^[5]²³;1984年8月15日—1985年12月3日,中国体育场技术合作小组一行10人赴毛里塔尼亚,对体育场设施的使用管理进行技术指导^[5]²⁵。

1990年6月,时任国家体委计划司财务处处长的刘扶民和另外10位同志组成专家团队,由他担任专家组的会计和财务部部长一职,到贝宁对“国家友谊体育场”进行了为期两年的合作管理工作。贝宁是与中国建交较早的非洲国家,两国感情深厚、关系密切。20世纪70年代,中国为贝宁援建了能够容纳3万名观众的“国家友谊体育场”。援建项目交付使用后,专业人员短缺问题一直以来都没有解决,导致这座国家级的体育场始终处于不良的运行状态。根据实际情况,中国派出了包括声、光、电、通讯等方面的专家组,前往贝宁合作管理体育场。专家组采取了内部精简开销、引入各种文艺体育赛事等措施进行改革。同时,还根据当地足球运动比较普及、观众人数较多的特点,组织策划并成功举办了贝宁、尼日利亚和多哥的足球联赛。只用了半年的时间,体育场的使用率便得到了有效提高,实现了扭亏为盈。帮助了受援国人民自力更生、自己“下海捕鱼”,真正实现了“授人以渔”的目标。

2.3 积极参与多边体育对外援助

在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及重返国际奥委会大家庭以后,中国积极参与多边体育对外援助。1980年10月3日—1981年1月16日,原北京体育学院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乒乓球培训班,有巴布亚新几内亚、孟加拉、菲律宾和泰国的乒乓球运动员参加

学习^[6]。作为对“发展体育运动国际基金”的捐助,中国再次承办了第二期,为发展中国家进行培训。1982年4月5日~7月15日,来自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和斐济的6名运动员参加此班^{[4]10-11}。

2005年6月18日—19日,国际射箭联合会第46届代表大会在西班牙马德里召开,国家体育总局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主任高志丹等3人参会,中国的董文瑾当选为国际箭联发展与援助委员会委员^[7]。2006年11月,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开幕式上,胡锦涛着重指出“中国始终坚定支持非洲民族解放和国家建设,从培训技术人员到培训各类人才,从援建坦赞铁路到援建各项工程,从派遣医疗队到派遣维和官兵,都体现了中国人民对非洲人民的情谊。”^[8]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为集中的地区,也是中国体育对外援助的重点,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和未与中国正式建交的国家均受到了中国的无私援助。中非之间的互相支持,巩固了双方的友好合作,也为双方的进一步交流提供了广阔的平台。今后要“加强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旅游等领域的交流合作,为中非合作提供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持”^[8]。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极大地促进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扩大了与国际体育组织交往的范围,层次不断提高。中国体育工作者紧紧把握住了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积极行动起来,使中国体育全面走上国际舞台。在2002年至2007年的5年间,国家体育总局参与了与法国、意大利、俄罗斯、韩国、日本、东盟等国家和地区共同举办的文化年、国家年、友好合作年活动,并配合“上海合作组织”积极参与了“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体育分委会”“国际太平洋体育论坛”“中国意大利委员会”“中国—西班牙论坛”“中英关系协调小组”“中阿(拉伯)合作论坛”等政府间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的协调机制和民间友好机构的相关活动。积极参与多边体育对外援助,拓展了中国国际体育交流的空间,促进了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友好关系。

2.4 “海外兵团”丰富了民间体育对外援助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出国审批制度的放宽,人们有了更多机会到西方学习、工作或生活。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在中国范围内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出国热”和“留学潮”。在这种热潮的带动下,一些有实力的退役或现役运动员与教练员,凭借他们优异的运动成绩和较高的社会知名度,获得了直接去海外学习或工作的机会,滞留或移民海外,成为了效力

其他国家体育组织的“海外兵团”^[9]。虽然,“海外兵团”主观上并不是以援助其他国家体育发展为目的,但他们或由他们培养的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上不断取得优异成绩,客观实现了对所在国家的体育援助。当然,这也推动了中国优势体育项目在世界的更广泛发展,宣传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和丰硕成果,传播了中国的优秀文化,承担了“民间体育援助大使”的重要作用。

“海外兵团”一般都是中国的优秀运动员和知名教练,主要集中在乒乓球、体操、跳水、排球等优势项目中。仅乒乓球一项,1990年在国外的运动员和教练员就达到300多人。以2008年北京奥运会乒乓球项目为例,乒乓球比赛共有77名男女参赛者,其中原籍中国的球员就占了一半,而且在女单16强赛中,除了3名中国运动员外,有10人来自中国,只有3人是地道外国人。改变国籍来代表其他国家参赛,已经成为中国竞技体育人才输出的最直接路径,是优势运动项目人才过剩时的一种必然选择,也是改革开放的大势所趋。从国际体育交流与合作的视角来审视,“海外兵团”现象具有独特的意义。通过他们提高了所在国家在该项目的竞技水平,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国运动员摘金夺银的难度大大增加,但却促进了自身训练手段改革和体育科研的紧迫发展,最终推动了世界竞技水平的整体提高^[10]。这与国家体育总局提出“养狼计划”的目标完全一致,成为“引进”和“输出”两个方向的不同形式。正是因为“海外兵团”的存在,才使中国体育在分享世界经验的同时,也使全世界分享了中国经验。

3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体育对外援助的贡献

3.1 有效配合了国家外交大局的需要

援外教练通常被誉为“民间外交大使”,凭借工作性质的优势和受援国上、中、下层都能广泛接触,这就为广交朋友、深交朋友、创造了有利条件。他们以精湛的技艺、良好的作风、优异的成绩赢得了人心,朋友越交越多,友谊与日俱增。富庶的文莱国是与我国最后建交的亚洲国家。文莱苏丹的亲兄弟是该国的外交大臣,此人酷爱中国武术。中国驻文莱大使获悉此事,力促政府外派武术教练,并多次打电话进行沟通。很快,中国就向文莱派出了优秀的武术教练,悉心地教授大臣各种武术套路。大臣的水平日渐长进,兴趣越发浓厚,与教练的感情也越处越深。后来带教练进皇宫,向其兄苏丹详细介绍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并运用中医手段帮助苏丹进行按摩治疗,收效显著。中国使馆人员通过援外教练

的媒介和桥梁,加强了与文莱的外交关系。这是一起典型的体育外交促进官方外交的事例,大大增强了中文两国的友谊。

非洲国家每当国庆或其他重大国事活动时,都要聘请中国团体操教练帮助排练大型表演。届时,所在国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等党政要员都会亲临出席。上百场这样数千人参加的团体操表演,场场成功,无一失败。表演结束后,中国援外教练都会受到所在国元首或政府首脑的接见和表彰。当地的广播、电视、报刊也会进行广泛的宣传。中国教练走在街头,当地群众都纷纷向他们点头致意,并高喊“中国!中国!”中国驻外使馆在完成这样重大的政治活动中也倾尽了全力,在吃、住、交通、翻译等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及全方位的配合。通过这样的活动,大大加强了驻外使馆与当地有关政府部门要员的联系,有力扩大了中国的政治影响。

3.2 一如既往地承担着国际责任

国际体育援助计划是一个世界范围的募捐活动,通过在全球开展14岁以下青少年中长跑、世界狂欢节和多项体育文化活动来发动募捐,帮助经济落后国家儿童保健事业的发展。该活动发起人曾多次与中国驻英国使馆联系,极力邀请中国参加。1988年4月24日,北京1300多名中、小学生举行“千米长跑”,从而揭开了中国参加1988年国际体育援助计划活动的序幕。9月11日,由国家体委、中国红十字会、国家教委、广播电影电视部共同主办的“国际八八体育援助计划中国北京大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万里委员长主持起跑仪式,并点燃第一支火炬,近千名手持火炬的中国运动员在天安门广场开始了在世界各地300多个城市同时进行的“与时间赛跑”活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和中国驻英大使表示,这一活动符合中国和平外交政策,契合红十字会人道主义宗旨。在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带动下,体育场馆设施的援建虽逐渐减少,但体育教练的外派却与日俱增,在国外执教的中国教练年均保持在200人次以上,他们分别执教成年、青年和少年等各级别的国家队、地区队或俱乐部队。特别在1990年亚运会的成功举办之后,向中国提出体育援助要求的国家大幅增加,在1991年外派的体育教练为105人^[11],达到了建国以来一个新的高峰。截至2007年,应世界各国的邀请,中国共向世界上123个国家和地区派遣了36个体育项目的2547名体育教练人员^[12]。其中,仅乒乓球项目,中国就向80多个国家和地区派出了约500人次的援外

教练员。已故国际乒联主席荻村先生曾在国际乒联大会上多次赞扬中国一如既往的承担国际责任,对世界各国开展乒乓球运动做出了巨大贡献。

3.3 为国家的统一贡献了力量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台湾人民也是华夏民族的优秀后代。中华民族的早日统一不仅是大陆人民和台湾人民一致愿望,更是全球华人的共同心愿。但是台湾当局却一意孤行,不时抛出违背台湾人民意愿的“台独”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直接向亚非拉一些小国提供金钱援助,成为台湾在国际上拓展生存空间的主要外交政策。中国政府在给予强烈谴责的同时,体育对外援助也卓有成效地遏制了“台独”势力的扩张。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体育对外援助在配合国家政策,促进国家统一大业的进程中贡献了无法替代的力量。中国派往瓦努阿图的乒乓球教练刘民忠,在新世纪上演了一次特别的“乒乓外交”。2004年11月3日,瓦努阿图总理沃霍尔以私人名义访问台湾,擅自与台湾签定了“建交公报”。中国政府立即做出反应,发表声明、提出抗议,但并未宣布断交。因为中国政府坚信,中瓦两国人民友好基础是牢固的、是经得起考验的,该国政府不会因为个人错误而损害两国关系大局的。事情发生后,有关部门指示刘民忠暂缓回国,利用工作性质的优势,积极开展“乒乓外交”,在该国体育官员、运动员和他们的亲戚朋友中大力宣传两国人民的友谊,让他们充分了解台湾的历史与现状。在形势紧迫的时间内,刘民忠不辱使命,反复耐心地做工作,赢得了该国体育界的广泛理解和支持。一位体育官员多次承诺“中国是个很友好的国家,瓦国人也不会忘恩负义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肯定会支持你们的,请刘教练相信我们。”^[13]2004年12月6日,该国奥委会主席向刘民忠颁发了国家体育荣誉勋章,总统专门接见他并合影留念。可见,在这样特殊事件的背景下采取以上行动,是该国体育界释放的一个重要信号。次日,当地各大报纸均用了大量篇幅报道此次授勋,详细介绍了刘民忠执教国家乒乓球队以来所付出的艰辛和取得的成绩,这是向该国人民宣传中瓦友好关系和向外部传递更为重要信息的前奏。12月10日,该国部长会议作出决议,撤销11月3日个别人在台北签署的“瓦努阿图-台湾建交公报”。

3.4 为发展中国家体育事业的普及提供了保障

中国援建工程技术人员怀着真诚帮助发展中国家普及体育运动的强烈愿望,发扬国际主义精神,想

受援国家之所想,急受援国家之所急,根据各个国家的民族特点、历史文化,进行了独特设计、精心施工,并克服了各种困难,按时交工。援建的体育场馆设施新颖美观、质量过硬,深受发展中国家的欢迎,得到了受援国的高度评价。塞拉利昂总统史蒂文斯称赞中国为该国援建的体育场,质量是“非洲第一流水平”的^[14]。还有的非洲朋友称赞“中国给非洲戴上了一条金色的项链,给非洲增添了新的光彩”^[15]。前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赞扬“中国在世界体育中起着重要作用,中国是第三世界的榜样。我去过非洲,参观了许多非洲国家。在那里,我看到了许多中国援建的体育设施。国际奥委会一致认为,应当感谢中国政府,表彰中国的高尚行为。”^[16]

中国政府援建的体育场馆设施集中在发展中国家,都是符合国际标准的,很多援建项目成为受援国当地的标志性建筑。虽然这些国家贫穷落后,经济水平并不发达,但其人民却十分喜欢参与体育活动。中国援建的体育场馆设施为当地民众提供了锻炼的场所,多次被受援国用于承办洲际或地区性体育赛事。截至 2009 年,中国政府援助建成了 2 000 多个公益性的、生产性的和基础性的体育设施项目,为 50 多个发展中国家援建了 70 多个体育场馆设施^[17]。其中包括体育场、体育馆以及游泳跳水馆(场)、射击馆和板球场及运动员公寓等配套设施,它们主要分布在亚非拉地区,集中在非洲^[18]。与此相应,中国政府定期外派专家适时进行维修扩建,并提供了长期的技术合作、更新体育器材设备、培训人力资源等方面的体育援助。

3.5 提高了受援国的竞技体育成绩

应受援国的要求,中国每年都会外派大量的、高水平的援外教员。有些曾经是叱咤体坛风雨的优秀运动员,有些还来自优势项目的一线教练。援外教员会将中国先进的训练技术、科学的训练方法带到世界各地,他们良好的专业素质常使受援国的体育水平迅速提高。2003 年 4 月 28 日,应墨西哥体委邀请,国家体育总局人力资源开发中心派出的赴墨西哥教练团启程。墨西哥聘请中国教练只是一种尝试,旨在为其选拔培养下届奥运后各人选,在全国比赛中得到验证后,这批队员将参加北京奥运会。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也培养一批自己的教练员。一年多来,中国教练团克服诸多困难,所训练的运动员在短时间内竞技水平有了明显提高。特别是乒乓球、射击、跳水、羽毛球、体操、田径、举重等项目的选手,在国际和国内的比赛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好成绩,

他们训练的运动员在泛美运动会、墨西哥全国运动会和奥运会选拔赛等大型赛事上,共囊括 246 枚金牌、154 枚银牌和 109 枚铜牌。因此,多名教练被授予“最受欢迎的外国人”“最佳教练”等称号。中国教练团为祖国争得了荣誉,也实现了国家体育总局关于“打开拉美市场,站稳脚跟”的要求。

2013 年 12 月 11 日—21 日,第 27 届东南亚运动会在缅甸举行。应缅甸的要求,中国援助本次赛会并承担技术合作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同时,作为本次援缅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体育总局和商务部的领导下,由人力资源开发中心与中体国际共同向缅甸派遣的 28 人教练组,在援外工作中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为缅甸历史性地东南亚运动会上获得金牌总数第二、奖牌总数第四做出了贡献。中国和缅甸是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在人文教育领域的合作奠定了基础。此次赛会的成功举办拉近了两国人民的距离,拓展了两国关系的内涵,成为两国互利合作的亮点、体育交流的典范。

4 结束语

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发展历程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指引下,中国体育对外援助发生了一系列的改革与调整、充实与完善。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为外交服务”转变为“外交为经济服务”,体育对外援助在“平等互利、形式多样、讲究实效、共同发展”的引领下,在突出量力而行的原则下,与发展中国家的南南合作逐步繁荣,与发达国家的体育援助渐渐扩大,促进了中国主动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中国体育对外援助在继承优势的基础上,在致力于结构优化、质量提高和时效性增强的目标下,必定迎来全面发展的机遇期。

参考文献:

- [1] 张晓义,李光欣. 20 世纪 60 年代中国体育外交回顾[J]. 体育文化导刊, 2013(3): 137-140.
- [2] 沃德·沃姆丹姆,谢超. 中国外援的自由国际主义性质[J]. 国际政治科学, 2013(2): 121-155.
- [3] 周弘. 中国对外援助与改革开放 30 年[J]. 世界政治与经济, 2008(11): 33-43.
- [4] 国家体委. 中国体育年鉴 1982[M]. 北京: 人民体育出版社, 1985: 5, 10-11.
- [5] 国家体委. 中国体育年鉴 1985[M]. 北京: 人民体育出版社, 1987: 20, 23-25.
- [6] 俞大伟. 中国体育对外援助主导方式转变探究[J].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2016(2): 112-118.
- [7]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 中国体育年鉴 2006[M]. 北京: 人民体育出版社, 2007: 50.
- [8] 胡锦涛. 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讲话[N]. 人民

日报 2006-11-05(2).

- [9] 俞大伟, 李勇勤. 无偿与合作: 我国体育对外援助方式研究[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2016, 50(6): 22-29.
- [10] 林香菜. 我国乒乓球教练援外工作的研究[D]. 北京: 北京体育大学 2006: 28.
- [11] 国家体委. 中国体育年鉴 1992—1993[M]. 北京: 人民体育出版社, 1998: 256-258.
- [12] 祝莉, 唐沛. 中国体育外交 60 年: 回顾与展望[J]. 体育文化导刊 2009(12): 140-145.
- [13] 刘民忠. 为国效力不辱使命——在瓦努阿图国家乒乓球队执教的日子[EB/OL]. [2016-03-12]. <http://www.tyrc.gov.cn/info.yes? GUID=1087>.

- [14] 俞大伟. 我国体育对外援助的历史回顾[D]. 长春: 吉林大学, 2011: 16.
- [15] 伍绍祖.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史(综合卷) 1949—1998[M].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9: 469.
- [16] 国家体育总局. 改革开放 30 年的中国体育[M]. 北京: 人民体育出版社 2008: 326.
- [17] 罗时铭. 新中国体育对外交往 60 年论略[J]. 南京体育学院学报 2009, 23(6): 7-9.
- [18] 中国援外体育项目竖起丰碑[N]. 中国体育报 2006-11-06.

责任编辑: 乔艳春

(上接第 37 页)

组织“浮出水面”。而对于如何“转正”难题, 可以积极借鉴清华大学 NGO 研究所的对策建议, 积极探索对体育社会组织实行分层管理。1) 普遍备案, 即引导“浮出水面”, 了解存在; 2) 登记许可, 即对于参与人数多、活动经费大的民间体育社会组织则需要政府登记许可; 3) 公益认可, 即对于声誉好、影响大的民间体育组织, 经过公益认可, 政府可以给予资金募集等权利。

4 结语

作为一种制度安排, 我国体育社团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既定制度环境的导向和约束。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 尤其是在国家和社会治理现代化背景下, 我国体育社团的功能价值被赋予更多的期待, 而现有制度环境影响了体育社团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些客观情况的存在已经引起实践关注和理论思考。就我国体育社团承接政府职能转移来说, 完善相关政策的同时, 自身组织的规范发展与外在制度的顶层设计是当务之急。在顶层设计方面, 需要明确政府与体育组织(包含体育社团)的合作关系, 变社会组织为政府服务为向社会服务转换, 改革社会团体的管理制度, 提高社会组织的专业化水平, 为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奠定组织保证与制度支持。尽管制度的设计和政策的完善需要渐进的探索过程,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 在体育强国和全民健身战略实施背景下, 包含体育社团在内的我国体育社会组织将会呈现“角色更加明晰、价值愈加凸显、发展逐步完善、作用日益突出”的发展态势。

参考文献:

- [1] 黄亚玲. 论中国的体育社团—国家与社会关系转变下的体育社团改革[D]. 北京: 北京体育大学 2003.
- [2] 道格拉斯·诺思. 经济史中结构与变迁[M]. 陈郁, 罗华平, 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80: 225-226.
- [3] 储建国. 中国政治制度的三层分析[J].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 60(6): 901-906.
- [4] 胡伟, 程亚萍. 体育伦理视野下的我国《体育法》修订[J]. 体育科学 2013, 33(7): 76-87.
- [5] 秦毅, 周爱光.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价值的探讨与反思[J]. 体育科学 2008, 28(12): 69-75.
- [6] 高丙中. 社团的兴起及其合法性问题[J]. 中国青年科技, 1999(3): 19-22.
- [7] 陈文通.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理论思考[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12(4): 11-16.
- [8] 谢琼桓. 论北京奥运会后中国竞技体育的价值取向和策略取向[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2011, 45(11): 5-14.
- [9] 卢元镇. 论中国体育社团[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1996, 19(1): 1-7.
- [10] 刘天宇, 李晖, 吴然. 韩国老年体育对我国老年体育发展的启示[J]. 沈阳体育学院学报 2014, 33(5): 33-38.
- [11] 陈媛, 刘鑫淼. 民间文化社团的意识形态文化功能探析[J]. 学术论坛 2012(12): 62-66.
- [12] 谭志林. 走向公民社会: 地方社团发展的制度分析—以北京市、温州市、哈尔滨市社区为例[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76-77.
- [13] 王旭光, 杨莉, 王迪佳, 等. 我国地方体育社团的现状、面临的问题和发展对策研究—基于建设多元化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的视角[J].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2008, 23(4): 302-306.
- [14] 陈金罗, 刘培峰. 转型社会中非盈利组织监管[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58-59.

责任编辑: 乔艳春